

海派双峰 仰之弥高

王琪森

上海浦东吴昌硕纪念馆在己亥年新春后首开的是《时代巨匠——吴昌硕程十发书画作品展》，从而为海派艺苑增添了盎然的春意，是为东风第一枝。

吴昌硕是近代海派书画领袖，程十发是当代海派书画领军。因此，这个展览正凸显了海派艺术的正脉与艺魂。从苍生苦铁到一程十发，他们在笔墨追求上出古入今、开拓创新，在风格建构上自树一帜、成就卓然，彰显了一种鲜明的民族精神、强烈的文化自信与高远的审美价值，对于当下的海派书画是颇有启迪意义与引领作用的。

创新，是艺术家永恒的话题与毕生的追求。但何谓创新？即是对传统精深的把握，对风格独特的创建，对系统整体的突破。“自我作古空群雄”的吴昌硕曾豪迈地自言：“我性疏阔类野鹤，不受束缚雕鏤中。”他以自己的诗书画印践行了“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从而成为海派书画创新的一面大旗。特别是他在丹青翰墨、铁笔纵横中，弥散出那种雄健郁勃而刚劲强烈的金石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时代标杆，产生了普世价值的认可，从而契入了知识、信仰与思想的审美层面与历史范畴。

“取古今中外法而化之”的程十发，以那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变汇东西，濯古来新”的精神，孜孜以求于笔墨上的拓展。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期，他就为探寻变法之道、创新之源而深入云南德宏、景颇族瑞丽一带体验生活。云之南旖旎多姿的景色和少数民族亮丽俏美的风情，使他获得了变法的灵感和创新的中介。而后他又吸取了西画的构图造型和色调光影，从而最终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程家样”，那飘逸灵动的线条、浪漫飘逸的造型、瑰丽雅致的色彩、诗意盎然的语境，展现了新的时代风采。由此可见，

从吴昌硕的“金石精神”到程十发的“程家样”，他们的创新是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与艺术史地位的，而我们对其的认知与研究，还远远没有到位。

吴昌硕作为清末民初的海派书画大师，程十发作为当代及至新时期的海派书画大师，他们的笔墨相接、艺绪相传与时空相衔，可以讲是演绎了一部生动的海派艺术发展史。唯其如此，这次举办的《时代巨匠》展，让二位“双雄”穿越岁月而相聚在一起，是颇有史诗性质的。而且从一个更宏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现实来看，二位大师不仅创造了艺术的高峰与笔墨的经典，而且他们分别扶持精英、打造团队，在他们身后形成了一个名家群体。

吴昌硕以其才艺高蹈、德高望重而设帐授徒，并对众多的弟子热心扶植、真诚相待、因材施教。当年青的潘天寿拿自己的书画请教时，吴即亲赠篆书对联：“天怪地惊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以资鼓励。当沙孟海第一次见吴时，冒昧地将一大叠印稿请吴挑选，吴不仅耐心地一一评点，而且写诗指教。从在们中先后走出了陈半丁、陈师曾、潘天寿、王个簃、沙孟海、钱瘦铁、诸乐三、徐新周、诸闻韵等，这是近现代艺术史上的阵容最为壮观的大师名家团队。

程十发作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海派书画大师群体中的领军者，他的“三釜书屋”也集聚了一批学子，他不拘一格，循循善诱。特别是他于1984年出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后，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艺术人才严重的青黄不接，他筚路蓝缕、使命在肩，大力培育精英、鼓励创新、唯才是举。当时画院中的一些中青年画师为突破传统而自辟蹊径，受到了一些非议乃至攻击，他却旗帜鲜明地说自己就是：“一生追求不一样。”从而使上海中国画院

崛起了一支新兴的海派书画精英团队，如张桂铭、杨正兴、韩天衡、毛国伦、施大畏、韩硕、车鹏飞、马小娟等。这应该讲也是程十发所作出的不应忘却的历史贡献。

《时代巨匠》展中的二位大师，都是与他们的时代相守相伴，命运与共的。他们是真正具有可贵的社会公共意识与历史使命责任的艺术家，从道义担当到家国情怀，他们都是身体力行、义不容辞的。吴昌硕出身贫寒，饱受战乱之苦而家破人亡，因此他是极具忧患意识与家国情结的。他早年为抗击倭寇而不顾个人安危，跟随吴大澂北上出征，兵锋直指辽东。他为了抢救国宝汉三老石碑而在病臂发作的情况下作画义卖，并到处奔走筹集巨额资金。尤其是在晚年体弱多病的情况下，积极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救助及慈善赈灾。就在《时代巨匠》展出之地，原是浦东医院第一任院长陈桂春的故居，当年他和王一亭在此作画，资助我们自办的第一家民族医院等。这些义举善事，充分展示了一位海派书画领袖的人格力量和爱国精神。

程十发亦继承了海派画家这种关爱社会、关怀民生、慈善救助的优秀传统。他多次捐画捐款，用以扶贫帮困和赈灾救济。当年画院的画师及职工住房相当困难，为此他夜以继日地作画30幅，集资筹款以解房荒。抗击非典期间，他创作了《竹报平安》无偿捐给上海慈善基金会。程十发作为当代书画收藏大家，有不少珍贵的古字画，价值连城。但他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了推动海派艺术的发展与提升，先是将122幅宋元明清字画无偿捐给上海中国画院，其后他又将80幅字画精品无偿捐给自己的家乡松江“程十发艺术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而当他远行时，我们看到他身上覆盖的仅是一条十分简朴的松江土织布蓝色格子被，一位大师用他最后的告别，佐证了何谓“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无须讳言，近年来各类艺术展览很多，但像《时代巨匠》展这样能给人心灵震撼和精神感悟的屈指可数。

黎明食品商店

顾益君

而动，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也推出24小时的零售服务举措，并更改店名为黎明日夜商店，增设小药箱、邮政投递箱、针线包等夜间便民利民小服务，引领松江商业条线为民服务的风向标。

70年代中期的某年，上海益民食品厂试制成功话梅糖；上海卷烟厂开发成功“凤凰”牌香烟，独特的口味和香味一时风靡上海。黎明食品商店是上述新产品甫一上市供应时松江唯一的零售窗口。开售当时，顿时“洛阳纸贵”，竟然出现排队购买的盛况。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品短缺年代商品供应的匮乏和人们对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追求和渴望。

松江市民对黎明食品商店留有深刻印象和记忆的还有二楼夏令供应的刨冰和绿豆汤。盛夏时节，酷暑难耐。在彼时娱乐休闲方式乏味单调的时期，下了班、放了学的松江市民去黎明食品商店二楼冷饮部喝上一杯冰凉爽解解渴的刨冰或冰镇绿豆汤是最为酣畅淋漓的舒心事

剑门蜀道

杭 生

蜀王。声称为了便于运送石牛，引诱蜀王将蜀道加宽。还将五位美女赠与蜀王。结果，“金牛”并没有“便金”，而五丁力士与五位美女却因山崩死于梓潼县七曲山中。道宽了，便于行军作战。五丁力士死了，抵抗的力量也就削弱了。公元前316年，蜀国被秦惠王所灭。

秦末，刘邦也是利用巴蜀道北段在翻越秦岭中的子午道、陈仓（今宝鸡）道和祁山道时，由韩信上演了一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好戏，由此拉开了楚汉两雄争霸的序幕，这成语也成了《三十六计》中的第八计而闻名天下。

回程途中，在千佛崖景区，看到了崖下那段因修川陕公路而填埋的古蜀道，现因公路改道而重现天日，还是那样的厚实和完整。

翌日，去剑门难关。眺望着两边大小剑山72峰，峰峦叠嶂，近处是刀削斧劈似的悬崖峭壁。古蜀道穿过关楼，厚重的青石板沿着山壁一级一级伸向远方。仰望关楼，耳边的风声仿佛成了万人攻关的呐喊声。

公元263年秋，三国时期的魏国大将钟会率十万大军沿金牛道正面进攻剑门

了。冬令时节位于黎明食品商店对面的黎明自制工场门市部，沿街供应的沙琪玛、老虎脚爪（一种形似老虎爪子的糕点）、橘红糕等时令糕点也常令行人垂涎欲滴，忍不住掏钱购买，回家与家人分享。

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华、双喜、牡丹以及长醒宝等部分沪产和万宝路等国外品牌的卷烟，市场供应紧俏。根据当时的国家卷烟供应政策，县烟糖公司对部分紧俏卷烟实行批供供应。为此在黎明食品商店位居高家弄一侧开设卷烟特供门市部，狭小的弄堂一时人头攒动。90年代初，在黎明食品商店二楼停止夏季冷饮供应后，为了拓展多元经营增加门店盈利，一度开设专门为儿童天地童装专业商场，进一步带动黎明食品商店的主业零售经营。

1994年，随中山中路拓宽改造，黎明食品商店拆除。1997年7月，在庆祝香港回归之际，由黎明食品商店脱胎而来的黎明超市在原址开设经营，再续了一段黎明食品商店烟糖副食品经营的新篇章。

2008年，松江烟草糖酒有限公司转型经营，黎明超市关闭，原有房屋开展资产租赁经营，黎明食品商店（黎明超市）彻底告别烟糖零售商品的经营历史，给老松江人留下了一段挥之不去的难忘印象。

关却久攻不下。剑门关是进入成都平原的最后一道重要关隘，此关被破，其它地方将无险可守。后因魏将邓艾从阴平道上冒险翻越摩天岭后，竟无路可走，邓艾弃死一搏，带头裹着毛毯滚下崖坡，跟随的将士们死伤大半，邓艾带着所剩的三千将士攻破了形同虚设的江油关和石门关。偷袭成功并攻占了成都。蜀后主刘禅不战而降，并令驻守剑门关的大将姜维也开关投降，将士们个个怒发冲冠，拔刀砍石，仰天长叹！就这样，蜀汉被灭。这刘禅在去了魏国后竟“乐不思蜀”。刘备一生的努力还是终止于这个“扶不起的阿斗”身上！相隔17年后，西晋武帝司马炎又灭吴，从而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李白的《蜀道难》，将蜀道的艰难程度描写得淋漓尽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剑门关曾身经50多次大战，无一失守，被誉为“蜀北之屏障，两川之咽喉”的雄关险隘。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朱元璋的大将傅有德又故伎重演，攻克阴平道而入川。清顺治六年，李自成部将也大破剑门。1935年，红军攻克剑门关，北上抗日。1936年川陕公路的开通，剑门蜀道也终究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剑门蜀道的硝烟早已散尽，历史终将远去，但这剑门雄姿与古蜀道还是能让人们重拾它当年的“峥嵘而崔嵬”。

蔡显与《闲渔闲闲录》

邢砚斐

蔡显，原名隐修。字景真，号闲渔、笠夫。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8），雍正七年（1729）中举。乾隆三十二年（1767）因《闲渔闲闲录》案被清廷斩决。

《清代文字狱档》“高晋等奏查蔡显呈首审拟折”中，称蔡显为华亭县举人；“书词狂悖比照大逆缘坐人犯清单”中，称蔡必照（蔡显之子）为江苏华亭县人。

准确地说，蔡显是松江府娄县人。《嘉庆松江府志·卷四十七“国朝举人表”》记：“雍正七年。蔡隐修，改名显。娄县人”。《娄县志·卷十八“选举表”》载：“蔡隐修”，并注明“北榜，华亭籍”。而查《华亭县志》，则未见记录。另，娄县许嗣茅《绪南笔谈》云：“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五月，吾郡闲闲录狱起……”据此，蔡显为娄县人无疑。

那么，奏折等官方文件中，如何会出现“华亭县人”这样的记载？究其原因，蔡显所居，在娄县集贤乡三十九保采花泾（现菜花泾）北，（亦为蔡氏归葬之处）。这一区域原属华亭县，1656年～1659年，曾划为娄县。1660年～1723年归并华亭县，1724年后复析，又属娄县。因此，1697年蔡显出生时，属华亭县，1767年《闲渔闲闲录》案发时，则已划为娄县。

华亭与娄，同为松江附郭县，尤其是集贤乡三十九保，位于府城外西北处，以采花泾为界，东为华亭西为娄，地理上容易混淆。再者，蔡显门生大多是在华亭。故奏折中有一：“当即飭令华、娄二县将该犯蔡显及其家属严加看守”之句。

乾隆年间《闲渔闲闲录》案，曾轰动一时。为避时忌，该案未见载入松江府及华、娄县旧志。《清通鉴》《绪南笔谈》《养吉斋丛录》《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等略有记载。均曰：蔡显著《闲闲录》，书中以论祀乡贤祠节孝一条，为郡绅所嫉。据其所作诗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查难分”句，又《题友袈裟小照》诗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行怒嗔”句，举报蔡显“隐约怨诽，情罪甚重”。

此案并不复杂：乾隆三十二年三月蔡显刻成《闲渔闲闲录》，共刻120部，自留20部。五月九日，因本地乡人举报其“谓其怨望汕谤”，蔡显赴松江府署呈书自首。五月二十一日，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初

藏家珍品

兮甲盘

王 家 年

兮甲盘，圆形，附耳，盘沿外侈，内底趋平，盘沿下饰窃曲纹，皮壳黑亮，传世状态明显，圈足缺失。内底铸铭文133字，记述了周宣王伐玁狁的战争，获得战功而受赏赐一事。清吴式芬《攬古录》卷三作“兮田盘”，吴大澂《愔斋集古录》卷十六作“兮伯盘”，方浚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七作“兮伯吉父盘”。

兮甲盘，因制作者兮甲，字吉父，一作吉甫，金文作兮甲、兮伯吉父，作器者兮甲之甲旧时释作田字，故又称兮田盘、兮伯盘、兮伯吉父盘。十堰房县人，约2800年前周宣王的辅臣，是著名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

“兮甲”为《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中华诗祖”的西周重臣尹吉甫之名。“兮甲盘”的绝世珍贵体现于盘上的铭文，记载填补了许多典籍中久已缺载的史实。“兮甲盘”记录早期的“丝绸之路”，南淮夷等少数部族向西周进贡丝织品，自黄淮至陕西的交通路线。

南宋末年战乱，“兮甲盘”流出内府。元代书法家鲜于枢定居杭州，居然在僚属李顺父家中发现此盘，当时已遭折断盘足，当作炊饼用具。自宋代面世以来，“兮甲盘”一直深受历代金石学家看重，历史上录有“兮甲盘”的重要出版著录多达35种。“兮甲盘”曾辗转为清末金石学家陈介祺所有，制有盘铭拓片，晚清民国时期的金石图册多有收录。

铭文译文：周宣王五年三月（月晦）庚寅日，宣王最初下令讨伐玁狁，逐之太原。兮甲吉甫遵王命，克敌执俘，凯旋归来。宣王赏赐兮甲吉甫四匹良马，一辆驹车。宣王又命兮甲吉甫东去成周（洛阳）掌政执法，责令四方交纳粮赋。至于南淮夷、淮夷，原向我周朝交纳贡帛的农人，不得欠缴贡帛、粮赋。他们来往、经商，不得扰乱地方和市肆。若胆敢违反周王的法令，则予以刑罚、征讨。特提请我周朝各地诸侯、百



姓，从事商贸应在规定的市肆进行，不得到荒蛮偏僻的地方去做生意，否则，也要给予处罚。兮伯吉父特作此盘记载。其肩寿（年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尹吉甫，为周宣王的重要辅臣。尹，是官名，大师、宰相。兮甲盘为兮甲吉甫的遗物。在《诗经·小雅·六月》中记述了尹吉甫挂帅出兵抗击玁狁的史实，诗中写到：“戎车既安，如轻如轩。四牡既佻，既佻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在商代，用干支纪录日期，60天一轮回，也有年月的概念，但这时的概念同今天大不一样。甲骨刻辞常见是先纪录占卜之日，如甲子，壬寅等。这种纪录方式让人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而使用生霸死霸则是一大进步。青铜器上的生霸死霸纪录加上月份和日子，就是干支日，再参照历史上的有关记录，可以让今天的人们相对精确地得出所记录的时间。例如兮甲盘上的第一句：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已考订兮甲盘属于宣王时期的。宣王在公元前827年开始统治，这个五年就是公元前823年。

官至三司史掾的鲜于枢，闲暇即与古铜为伍，一次，他在僚属李顺父家发现一只铜盘，已被家人折断盘足作为饼盘，鲜于枢细心考察，断定是古代器物，遂将盘收藏，此盘就是有长篇铭文、赫赫有名的传世重宝西周《兮甲盘》。这件器直至清末民初仍存，民国时被收藏家陈介祺收藏，此后流落天涯。

生活茶座

盛庆庆 书